

# 失守的边界 ——对我国记者诠释社群话语变迁的分析

尹连根 王海燕

## 摘要

如何理解新媒体对当下我国新闻业的冲击?学界路径不一,众说纷纭。为置喙其中,本文依托于对现有文献以及2015—2017年间所进行的记者访谈材料的分析,以边界工作作为理论框架来论述新闻边界的失守,以及由此而带来的记者诠释社群的话语变迁。为适应本研究的需要,我们在回溯Zelizer(1993)有关记者诠释社群概念的基础上,将其进一步细化为三个维度,即,记者对新闻平台的诠释,对新闻职业的诠释,对新闻产品的诠释。本文认为,新媒体的勃兴所带来的去专业化主要表现在平台边界、职业边界和报道边界的失守,从而带来记者诠释社群话语的相应变化。就平台边界而言,互联网尤其微博、微信的问世使得新闻平台大众化,新闻平台的垄断性诠释话语则相应地先后经历政治话语、市场话语、大众话语的变迁。就职业边界而言,数字时代使得新闻人日趋成为数字劳工背景下专业新闻的留守者、公众舆论的边缘人,新闻职业的垄断性诠释话语则先后由政治取向、精英取向而转变为普通职业取向,新闻工作者原有的权威性被消解、被祛魅。就产品边界而言,如今在流量导向的支配下,作为新闻产品的报道开启了流量决定新闻的时代,并相应开启了一个坏新闻才是新闻、娱乐性才是新闻的诠释话语转向。

## 关键词

边界工作、新闻专业主义、去专业化、新媒体、数字化、诠释社群

## 作者简介

尹连根,深圳大学传媒与文化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深圳大学传播学院教授。电邮:root.yin@szu.edu.cn。

王海燕,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副教授。电邮:haiyan.wang2009@qq.com。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一般项目(16YJA860009)“媒介融合趋势下新闻生产的社会学分析”的阶段性成果。

## Undefended boundar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journalistic interpretive communities

YIN Liangen WANG Haiyan

##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s to contribute to the discussion of a much debated topic as to how to understand the impact of new media on Chinese journalism. Based on analysis of materials gathered from industry journals and interviews with journalists, this article analyses the manifestations of de-professionalisation of Chinese journalism from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of boundary work and journalist's interpretive communities. It is argued that de-professionalisation of journalism brought by the thriving of new media is manifested by the loss of power in defending the boundary of three domains that are essential to journalism: news platforms, news work and news product. These three domains also constitute the main discourse theme of journalist's interpretive community. In terms of news platforms, the rise of new media especially the advent of Weibo and WeChat has made various platforms available to the general public, resulting in traditional media's loss of monopoly over the channels of news communication. With regard to news work, the wide adoption of digital devices has revived the potential of ordinary person to be a reporter, and those working in traditional media are no longer the dominant group influencing public opinion. As of news product, the communication environment shaped by new media technology has forced changes to the way newsworthiness is defined, and the values such as "bad news is news" and "no entertaining no news" has gained overwhelming importance. Altogether, these have challenged the authority of professional journalists, resulting in a process of de-professionalism in the arena of news communication.

## Keywords

Boundary work, Professionalism, De-professionalisation, New media, Digitalization, Interpretive community

## Authors

Yin Liangen is the vice director of the Center for Media and Social Change,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Shenzhen University. Email: root.yin@szu.edu.cn.

Wang Haiyan is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and Design, Sun Yat-Sen University. Email: haiyan.wang2009@qq.com.

This research is funded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Project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o. 16YJA860009) "Journalism production in the context of media convergence".

新媒体对新闻的冲击正成为无论业界还是学界都普遍关心的问题，不过方式不同罢了。这种冲击既反映在业界对过往黄金岁月的回忆，以至于业界的集体记忆正成为学者们追寻的热点（如，张志安，甘晨，2014；白红义，2014；陈楚洁，2015；李红涛，2016）；冲击也反映在学界的媒介融合之争和对新闻或新闻专业主

义进行再界定的努力上（如，Yin & Liu, 2013；尹连根，刘晓燕，2014；谢静，2016；陆晔，周睿鸣，2016）。另一方面，学者们也注意到，新闻业界的话语实践正在发生新变化，如李艳红、陈鹏（2016）研究认为新闻专业话语正表现为对专业主义语汇的边缘化、问题化，堪谓“‘专业主义’离场”、“‘商业主义’统合”。本文则尝试依托于对现有文献以及2015–2017年间所进行的记者访谈材料的分析，从“边界工作”（boundary work）的角度对当下新闻业所遭遇的冲击进行解读，试图论述新闻边界的失守及其表现，同时，我们将这种失守之势置于一个更大社会历史背景下来分析，在借用和拓展诠释社群（interpretive community）概念的基础上，论述我国新闻业在媒体、新闻人、以及新闻报道三大方面正在发生的话语转向。

### 一、新媒体冲击下的新闻边界研究

“边界工作”这一概念最早由Gieryn (1983) 提出。Gieryn认为，边界的建构既是纯粹的也是实用的，既是理论的也是实践的；它有助于相关专业人士获得知识上的权威性以及职业机会，尽管它难免会以灵活多变甚至不确定的方式不断地被界定与再界定。边界工作的三大功能（或目的）是：权威性的扩张（expansion of authority）、行业权威与资源的垄断（monopolization of professional authority and resources）以及对职业行为自立的保护（protection of autonomy over professional activities）（Gieryn, 1983: 791–792）。不同目的往往决定边界的不同话语策略和侧重点，因此，边界又往往是模糊、易变、有争议的。

新媒体的勃兴使得新闻业的边界问题日益为学界所关注，大体可以分为三种代表性观点。第一种观点立足于传统记者对固有新闻边界的保守与“修补”，如，Singer（2015）、Hermida（2015）等人认为，面对新媒体的冲击，传统媒体记者们一方面在努力适应，一方面擎起“负责”（accountability）、“透明”（transparency）、“查证”（verification）等大旗来进行专业记者和非专业记者的区分，以捍卫自己的专业边界。Carlson（2015: 10）甚至总结了新闻业维持边界的九种模式，包括扩张专业主义（即，吸纳新媒体作为新闻源）、驱逐偏离规范者（如，纽约时报开除抄袭和捏造新闻的Jayson Blair）、保护自立（如，不让管理层进行编务控制）等。

第二种代表性观点强调边界的变动，代表性概念包括“转换的边界”（shifting boundary）（Blaagaard, 2013）、“模糊的边界”（blurring boundary）（Domingo

& Cam, 2014) 等。如, Lewis (2012: 850) 认为, 新闻专业边界的张力源于传统媒体的专业控制逻辑和数字媒体的自由参与逻辑之间的矛盾, 对此, 适应与开放的混合逻辑注定将占据新闻专业意识形态的垄断地位 (a hybrid logic of adaptability and openness) (Lewis, 2012: 851), 记者在工作中对Twitter和Facebook的日常应用即是例证 (Hermida, 2012)。

第三种代表性观点是新闻的去边界化 (de-boundedness) (Loosen, 2015)。通过对新闻工作室文化变迁的研究, Hujanen (2016) 发现“读者评论”与“编辑素材”、专业新闻与非专业新闻之间的话语边界正在消逝。Loosen (2015) 认为, 去边界化不但指传统意义上的新闻在其与广告、公关之间的去边界化, 而且更关注媒体技术所带来的媒介形态的去边界化, 新闻与娱乐的去边界化以及创业新闻学 (entrepreneurial journalism)、公关新闻 (public relations journalism)、营销型新闻 (infomercial)、广告性评论 (advertorial) 等门类的兴起。

国内有关新媒体对新闻边界影响方面的研究尚不是很多。陈楚洁、袁梦倩 (2014) 认为, 面对互联网对传统媒体权威性的威胁以及边界的挑战, 传统媒体人多以“新闻专业主义”应对。不过, 社交媒体之下的新闻权威之争已经使得传统媒体人对其专业边界的坚守变得日益困难 (陈楚洁, 袁梦倩, 2015)。郑忠明、江作苏 (2016) 则从知识生产的角度研究认为新闻的核心知识和外围知识的边界在网络时代逐渐趋于模糊, 并进一步多样化、复杂化。

## 二、诠释社群

新闻业的边界工作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诠释性的话语实践, 新闻从业者是诠释边界的积极行动者, 他们通过对新闻价值的追求、新闻工作文化的形成、专业伦理的树立等策略形成诠释性社区, 定义其领地边界 (Lewis, 2012)。

在新闻传播学界, “诠释社群” (interpretive community) 作为概念最早是由 Zelizer (1993) 引入的。在 “Journalists as interpretative communities” 一文中, 她指出了当时主流理论框架视记者如专业工作者这一视角的局限性, 而提出了替代性理论视角, 即, 视记者为诠释社群, 阐明了共享话语意义在记者维持其作为一个社群而存在的重要性。而且, 这种话语主要生成于对关键公共事件的集体记忆和集体诠释中, 并通过非正式交谈、专业性评价、自传、回忆录等话语形式来完成。就学术层面来说, Zelizer引入这一概念的理论贡献自不待言, 这不但突破了专业视角的局限性, 而且开启了记者工作的文化视角的研究。尽管如此, 倘若溯及诠释社群这一



概念的源头,我们便可以发现,这一概念在运用于新闻学研究方面还可以走得更远一些。

“诠释社群”这一概念最早使用于语言学和文学批评领域。就语言学来说,当乔姆斯基等生成语法学者们更多强调语言规则的通性和内在一致性的时候(宁春岩,2011),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语言的使用最终取决于语言的使用者及其所构成的“言语社群”(speech community)(Hymes,1973)。这些言语社群往往具有共享的价值和信念,并且与其他言语社群区分开来,从而形成社群之间的边界。而且,社群边界“不仅只是人与人之间互动的问题,同样也是有关成员身份及其认同的问题”(Hymes,1973:66)。另一方面,在文学批评领域,在究竟是文本形态决定诠释话语还是诠释话语决定文本形态的争论中,Fish(1980)以自己的课堂实践为例,提出“诠释社群”的概念来支持后一种说法。他认为,文本本身是开放性的,取决于个体对它的解释,不过这种解释并非随意性的和孤立的,而是决定于其习得的,所在社群所共享的诠释策略。

由上述溯源可知,诠释社群的概念强调的是社群成员透过诠释行动对意义的共享,以及这种共享背后的身份认同。这种共享与认同是可以指向多方面的,取决于所讨论对象的不同。正是在此基础上,Zelizer发展出了“记者作为诠释社群”的概念。但是,Zelizer在讨论新闻记者的诠释社群时,将焦点主要集中于“关键事件”(critical incidents),比如,水门事件(Zelizer,1993)、肯尼迪遇刺事件(Zelizer,1992)等,关注范围显得相对狭窄了些,忽视了记者在日常工作和生活的话语实践。同时,Zelizer固然为新闻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文化面向,但只是笼统地描述了一个记者的诠释社群的存在,未能深入划分这一诠释社群的不同维度。

为此,在Zelizer既有理论的基础上,我们将记者的诠释社群再明确地细化为三个维度,即,记者对新闻平台的诠释,对新闻职业的诠释,对新闻产品的诠释。从这三个维度出发,我们将尝试性地针对不同年代记者在平台、职业、产品三个方面的典型性话语进行分析,以审视我国新闻业在新媒体冲击之下所发生的边界工作的变化以及记者的诠释社群的话语转向。

本文所依托的分析材料主要有两部分构成。一部分为建国后记者们的记录性文字。本文的着重点在分析新媒体的勃兴对新闻业所产生的影响,但是为了更好地分析和理解这种影响,我们将新闻业的变化放在一个更长的历史背景下来理解。对这种历史背景性的分析,我们主要依托相应历史时期记者的记录,但鉴于其背景性质,而且同时代文献都带有各自所在时代的鲜明色彩,所以,本研究只以一些代表

性的典型文字来论证相关观点。第二部分为作者之一在2015年底至2017年之间在北京、武汉、成都等地所做的记者访谈。这些访谈的主题之一就是了解记者们如何看待新媒体对新闻业的冲击。正是在对这些访谈资料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我们最终形成本文的理论解释框架。对这些访谈材料,出于研究伦理的考虑,本文仅公开采访对象所在单位,而对采访对象则统一匿名处理,以编号的形式呈现于本文。北京、武汉、成都三地采访对象分别以B、W、C开头来依次进行编号。

### 三、边界的失守与诠释话语的转向

从社会认同理论的角度看,边界,本质上关系身份认同与界定的问题,即“我们是谁”的问题,什么是“我们”,什么不是“我们”而是“他们”;什么是圈内人(in-group),什么不是圈内人而是圈外人(out-group),这些直接关涉到人的归属感,直接关涉到“我们”的边界将被划到哪里(Jenkins, 2014)。具体到我国新闻媒体业,从边界角度来看,Splichal & Dahgren (2016)提出的去专业化之势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即,失守的平台边界、失守的职业边界和失守的诠释边界;结合认同理论通俗来说,这三个方面分别对应三个不同的界定问题,即,“什么是媒体,什么不是媒体”、“什么是新闻人,什么不是新闻人”、“什么是新闻,什么不是新闻”。总之,我国新媒体勃兴之前的新闻平台垄断、新闻职业垄断、新闻产品垄断的局面都已经被打破了,甚至呈现为继续蔓延的态势。这种边界的失守从而相应地带来新闻业诠释话语的转向。

#### (一) 失守的平台边界

从新闻实践层面而言,我国新闻业的平台边界是一个从“质”和“量”两个角度不断往外拓展的过程,这种不断拓展逐步带来平台边界的被稀释直至如今的失守态势。而伴随这种失守之势的则是平台边界诠释话语的相应转变。

改革开放之前,报纸、广播、电视作为新闻平台是高度政治化的,乃至被等同于同级党委,成为同级党委的传声筒,这也相应地造就报纸等媒体当年的地位尤其是政治地位非常高,表现出对政治的高度依附性。广东老报人林里(1993: 13)在回忆当年党委领导报纸时说,“省委赞成什么,提倡什么,反对什么,我们一目了然,对于办好报纸,极端重要。……贯彻省委意图,执行省委指示,也就由被动,变为主动;由不自觉、半自觉,变为全自觉。”这一时期,新闻的专业化毋宁说就是政治化。尽管就新闻与政治的关系而言,平台的边界是模糊乃至同一的;但是,就新闻与公众的关系而言,高度的政治性构成了新闻平台清晰的边界,政治话语成

为界定平台边界的支配性话语。

后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新闻平台得到不断拓展,一改党媒一统天下的局面,市场化媒体作为新的新闻平台风生水起,使得平台的边界由单纯而狭窄的党报扩充至都市报。相应地,平台边界的诠释话语也有政治话语向市场话语转变,“经营”“收入”“市场”成为新的平台边界诠释话语的关键词。

有“中国都市报之父”之誉的前《四川日报》副总编辑及《华西都市报》总编辑席文举,后来谈及《华西都市报》作为中国第一份都市类报纸而创刊的动因所在时如是说:

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广告市场的结构已发生显著变化:房地产广告、生活用品广告、商贸广告等等取代了昔日生产资料广告的统治地位。这些广告的主要传播对象是城市市民。因此,城市市民喜爱的城市报纸就成为广告客户首选的媒体。……党报的功能不可能去改变,要增加广告收入,增强党报的竞争实力,办法只有一条:再办一张城市报纸(肖云,2013)。

换言之,对党报来说,办都市类报纸本是其因应社会环境和报业广告环境变化之举,但客观上,这却带来了媒介边界的扩大。一旦市场话语化为媒体人的自觉意识,报业的市场化之路越走越远,新闻平台的内涵与外延也相应地在新闻人的市场化探索中而得到不断开拓。在这样一种市场话语独霸天下的媒介环境里,甚至一些党报也主动走上市场化之路,丰富人们对于党报的新的理解。这方面,尤以《广州日报》为盛。报业奇才、前《广州日报》社长黎元江当时是这样解读《广州日报》制胜策略以及中国报业愿景的:

广东报业在经营管理上有几项改革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改版是其中之一。中国报纸的扩版始自广州日报。……自办发行不是广州首创的,但广州日报首创了连锁店这种报业发行的新举措。……媒介要实现跨媒体经营,建构以新闻为中心,出版、广电、发行、印刷等多项经营为一体的大型媒体集团。(梁桦、张百宁,2002:4-5)

类似地,时任南方报业传媒集团社长范以锦也将其亲力亲为的报业经营成功之道汇集成为一本书,即,《南方报业战略》。就这样,市场主导的诠释话语一方面丰富了媒体平台本身的含义,另一方面极大地拓宽了人们对媒体的想象力以及媒体

平台的边界。

具体来说,平台边界的拓展同时体现于“量”与“质”。“量”的拓展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新闻媒体数量倍增、单个媒体新闻容量倍增(“扩版热”)(文有仁,1998)、单个新闻媒体不断自我繁衍(典型如,南方日报至南方报业传媒集团的龙生龙、凤生凤的滚动发展模式)(范以锦,2005)。而“质”的拓展相对来说更复杂一些,结构上,先后由单一的机关报模式拓展到晚报、周末、都市报、经济类专业报,由机关化走向商品化、集团化;性质上,由依附性的政府机关拓展到相对独立的市场主体;功能上,由宣传向信息、产业拓展;角色上,由党和政府的喉舌扩大到社会的喉舌(李良荣,1995,2006,2008;曾繁旭,2009)。无论从新闻信息还是公共表达的角度看,新闻平台的拓展与丰富都使得人们在信息和表达方面具有了更多的选择性。

而随着互联网在二十一世纪初的快速增长,新闻平台边界又得到新的拓展;“媒体”作为概念,其内涵上的信息本位和外延上对网络媒体的囊括都极大地拓宽了其自身边界,对何为媒体的界定已经不再为传统媒体中人所垄断和左右。这种平台边界拓展带来的主要变化有二:传统媒体尽管忙于由线下往线上布点,但人们日益仰仗新浪、搜狐等商业网站获取信息;各类论坛与博客的时兴使得人们不必再依赖于传统媒体来进行表达,公众表达有了新的空间,尽管尚属小众媒体的论坛与博客其时的社会影响力还比较有限。

对平台边界的拓展,最具革命性的当属2009年微博的问世。在传统媒体准入门槛高不可攀、传统媒体平台相对稀缺的时代里,微博这一社交媒体作为替代性平台的出现极大释放了人们的表达欲,从而造就一个“人人都是麦克风”的新时代。一系列微博公共事件,如,温州动车事件、雷政富事件、上海法官集体嫖娼事件、刘铁男事件、深圳5.26飙车案、直播薄熙来庭审等,在颠覆传统媒体此前在公共话语中所具有的垄断性地位的同时,促成我国现有公共领域的结构性转型和产生替代性公共领域的可能(尹连根,2013)。对此,传统媒体纷纷抢滩新媒体,但到底无补于失守此前平台垄断局面的既成事实,至多只求不输于这场平台争夺战。而微信的问世则使得这种失守平台边界的状况变得更为加剧,微博的平台是电脑、微信的平台是手机,手机的便携性和时尚元素迅捷让微信获得比较优势,并将新闻平台由相对稀缺带入相对过剩状态,使得包括《新闻晚报》《风尚周报》《京华时报》等一批报纸或休刊或缩版,公众成为平台边界的拓展者、诠释者与实践者,公众话语成为新媒体时代新闻平台所具有的典型特征。

对中国新闻业来说,失守平台边界的影响既是有形的也是无形的,有形的是阵地的萎缩,平台的稀缺性被稀释,无形的则是边界的权威性随着阵地萎缩而逐步趋弱。面对这种平台边界失守态势,我国新闻人不但逐步丧失对平台的诠释话语的支配权,而且“跟”而不是“守”成为其新的平台诠释的关键词:

你看网民当中最活跃的就是我们的那群目标读者。那么,他们转移了阵地,我们得跟上去才能继续赢得他们的注意啊。对我们来说,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要我们的读者从平面世界转移到网络世界上去了,我们也要在网络世界出现才行啊。所以,不是说我们的读者抛弃了我们,我是说我们的读者找不到我们了,我们要让他们找得到。(B1,中国青年报,北京,2016年1月12日)

虽然年轻人可能不读人民日报了,但我们通过发展新媒体,通过建设现代传播体系,让他们也照样跟人民日报发生链接,接收人民日报传递给他们的信息与服务,这是我个人感觉最有收获的地方。(B2,人民网,北京,2016年4月23日)

## (二) 失守的职业边界

论及新闻专业主义时,学者们每每将记者作比于律师、医生,那就是,后两种职业都是建立在严格的专业知识和执照门槛之上的,而记者并没有严格的准入规定,毋宁说是一种建立在社会共识基础之上的职业。尽管如此,在我国,记者工作到底还是具有边界的,获得“新闻记者证”是进入这个行业的必要条件。不过吊诡的是,这种职业边界又越来越处于失守状态中,而这种失守同样与新媒体的勃兴有关。

改革开放之前及之初报纸的绝对稀缺状态天然地决定了记者职位的绝对稀缺状态,而报社显赫的政治地位演化为报社记者厚重的政治资本。由此,成为一名记者门槛之高可想而知,而这反过来又决定了记者地位之高。实际上,当时的记者多属于标准的国家干部身份,广东省老新闻工作者黄秋耘的回忆颇具典型性。他在回忆文章中说,“我在新华社福建分社担任代理分社长职务,是厅、局级干部,主要负责处理行政工作,可以列席中共福建省委常委会会议”(黄秋耘,1991:10)。也因为新闻人的相应干部身份,当时报社领导出席同级党委部门会议同样是常态,如,《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当时虽不是中央委员,但却不断参加中央许多重要会议,后来,甚至经常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钱江,2011),时任《教师报》总编辑的徐铸成(2010:254)在回忆录中写道:“教育部部长张奚若先生及常务副部长



董纯才先生也十分信任，让我列席教育部部务会议”。换言之，在政治挂帅的时代，记者以政治资本著称，新闻工作即政治工作。

后来随着报纸门类增多、平台边界扩大，以和政府脱钩为特征之一的新闻改革逐步走向深入，新闻单位逐步剥离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在政治资本被稀释的同时，新闻单位却积聚起丰厚的经济资本，足以财大气粗、招贤纳士，许不了高官却给得了厚禄，以令“天下英雄入吾彀中”，职业边界的精英化取向十分明显。所以，在21世纪初的新媒体时代之前，媒体之高门槛现象并不鲜见，比如，像广州三大报业集团（南方报业传媒集团、羊城晚报报业集团、广州日报报业集团）基本上为北大中文系、人大新闻系、复旦新闻系等名校名专业毕业生所垄断，形成分明的职业边界。与这种高职业边界相对应，“理想”“热情”“优秀”“自豪”一类用词成为这一时期媒体人在诠释职业话语时的支配性语汇，而且，他们竭力对这段日子进行迷思化：

这一年开始，……因为来来往往却坚守同一理想的朋友们，我的魂彻底地迷失其中，或喜或悲，都无法自拔。（陈菊红，2005：276）

当时我觉得，《南方周末》就是中国最好的报纸，最好的媒体，也是我能找到的最好的工作。到现在为止，我都为当时能进《南方周末》感到幸运和自豪。

（方三文）<sup>1</sup>

（《东方时空》）这扇大门一旦打开，才发现众多的精英其实已经在央视周围徘徊多年。他们年轻、激情洋溢、对电视充满热爱……他们都是理想主义者。

（孙玉胜，2003：59）

从职业边界角度说，这些叙事不过是在强化当年的职业边界，从而反衬出新闻人如今失守的职业边界而已。从塑造共识、创造差异的认同视角看，这与其说是怀旧，毋宁说是为了突出新旧职业边界的差异性，通俗地讲就是，时代不复当年，记者群体亦不复当年了。这些文字在迷思化旧职业边界的同时，其实是从别一角度在表达对新职业边界的否定与不认同。

那么，新的职业边界在哪里？

如今，新媒体勃兴造成报业利润不断下滑与社会影响力趋弱，从而带来新闻人职业自豪感与满足感逐渐下移，同时带来他们在诠释职业话语方面的变化：

记者没有‘社会精英’的感觉了。现在这么说，感到很可笑。我们报社有一个



小年轻，我就跟他谈，你不要把这份工作想得那么崇高，就是一个饭碗，你衡量一下，作为一个饭碗的话，这个工作值不值得你干下去。……现在干新闻这份工作，就要‘去理想化’，不然人会疯掉的，真是这样的。（C2，四川日报，成都，2017年4月21日）

早几年记者其实有点个人英雄主义，就是有点侠客的样子。我只能说这个职业正在去魅。在市场面前，整个职业还是没有回归到一个正常的职业心态。我对记者这个职业的趋势判断是这样的，未来这个职业概念会泛化。记者这个职业定义边界很模糊，门槛很低很低的，不要把它神秘化，以前因为有报社有编辑部把很大一部分新闻爱好者挡在外面了，但是现在没有门槛之后，你会发现，一百个人中总能选一个比你厉害。（W1，大楚网，武汉，2017年3月12日）

如果说报业黄金时代精英式的职业话语着力强调的是自身职业边界的差异性的话，那么，新媒体时代的新闻人则着力抹煞这种职业边界的差异性，转而强调新闻职业边界的泛化，以等而视之的扁平化思维来审视自身职业的边界所在。当然，这种祛魅式的职业话语固然包含了新闻人的内省精神在里面，但更重要的还是新媒体所造成的平台边界的失守使然。平台边界的失守导致原有维持职业相对稀缺的种种边界区隔因素随之轰然坍塌，而新媒体强大的消解职业魅力（charisma）、使职业区别扁平化的祛魅（disenchantment）功能更加重了新闻业的边界失守之势，从而形成职业边界随之失守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也带给一些仍留守在传统媒体的人们巨大的职业认同困惑感：

新媒体让我感到无所适从，不知道读者要什么，我又能给它什么。我们平时聊的时候，大家普遍感到一些职业迷惑。像以前王克勤那样，北京的出租车黑幕调查，现在还有可能给你半年时间让你操作一个题材吗？有时候感到很沮丧，我很认真地、投入了感情写的稿子，对他人来说根本没有价值。（C1，华西都市报，成都，2017年4月21日）

### （三）失守的产品边界

就新闻产品——报道而言，其边界理论上来说当然归属于新闻记者，但我国新闻事业作为我党事业一部分的属性注定新闻与政治这两个场域的边界是模糊的，这也就导致新闻产品诠释主体的模糊，以至于以邓拓等人为代表的新闻人在边界诠释能动性方面的发挥终究且也只能以被标签为“书生办报”并被讥之为“死人办报”而无疾而终（童兵，1994；吴冷西，1995；Wang，2015）。此后直至改革开放之

前,新闻与政治的边界几乎表现为同一性,新闻表现出浓厚的政治代言色彩。改革开放之前,且不论人所共知的毛主席时而代笔《人民日报》社论的现象,单就如何做新闻而言,当时的《人民日报》和新华社领导就时而被毛主席耳提面命(吴冷西,1995)。而这种联手界定新闻之举也常态性地存在于地方。五十年代工作于新华社广东分社的尤淇回忆,他与当时的广东省委书记陶铸是老朋友,陶铸经常会对新华社广东分社和《南方日报》进行新闻报道的指导,比如,“多发广东高级合作化的消息”“撰写(广东)抗旱、生产的言论和新闻”等。而对一些没有及时配合或者表现出独立性的报道,陶铸严厉批评尤淇“有严重的脱离政治的倾向”(尤淇,1992:87)。也就是说,新闻性即政治性,新闻报道的边界与政治宣传品的边界两者合二为一了。

改革开放后,治理上积极自由向消极自由的转化而产生的新闻协商区域(王海燕,2012;Wang,2016),新闻平台结构和功能的多元化,可资利用的理论性诠释资源趋于丰富<sup>2</sup>,历史悠久的“士”文化传统(余英时,2003),诸多因素集合到一起从而使得我国新闻产品边界的诠释话语活跃起来,形成儒家历史使命感话语、党的新闻工作话语、西方专业主义话语和市场经济话语相互混杂的诠释体系(Pan & Lu,2003)。其结果则是,通过潘忠党(1999)所概括的“边缘突破”“非常规”实践等方式,新闻报道无论内容还是形式的边界都被极大地拓宽。如中央电视台探索早间新闻模式,创办《东方时空》栏目,改变人们早上不看电视的习惯,尝试大型直播报道(孙玉胜,2003)。孙玉胜后来是这样诠释和反思中央电视台在新闻报道边界上所进行的一系列拓宽的:

始于1993年的电视新闻改革在理念上是从实验与电视观众新的“说话方式”,也就是新的电视叙述方式开始的。比如,叙述的态度应该是真诚和平和的;叙述的内容应该是观众关心和真实的……有人说,新闻是历史的第一次草稿,所以我们更新电视新闻的叙述方式其实就是在改变对历史的记录方式。(孙玉胜,2003:4)

这种产品边界的扩大一方面丰富了新闻报道的门类,另一方面使得报道向新闻本性回归,向新闻专业主义回归。

但是,随着二十一世纪初网络媒体的勃兴,大众越来越作为不可忽视的力量介入对新闻事件的诠释过程之中,甚至影响事件的走向,如,邓玉娇事件、厦门PX事件、番禺垃圾焚烧事件、李刚事件。不过,大众在线上的影响力仍需依附传统媒

体来放大,换言之,尽管大众诠释话语越来越作为不可小觑的因素而被囊括进新闻话语诠释体系,并使得新闻业边界诠释话语复杂起来,但专业记者群体这时仍是诠释边界的垄断者。

如平台边界的失守一样,真正对诠释边界的重创还是始于微博。不过这里先需漾开一笔的是,Schudson(2008)在驳斥建构论者俨然道记者“偏爱”官方乃有意为之的观点的时候,他特地强调,纵然官方想利用新闻记者,但新闻记者总偏爱事件、冲突和丑闻,而并非以官方意志为转移,这是由长期形成的新闻文化所决定的,这也正是民主为什么需要不怎么可爱的新闻界的原因所在。类似地,微博正是在事件、冲突和丑闻<sup>3</sup>这三大坏新闻领域异军突起,成为这三大领域的主要诠释者,而使得专业新闻人日趋游离于这三大领域之外,甚至有被边缘化之虞。通俗来说,我们习惯的东西正变得渐渐陌生起来,我们已经过于被好新闻才是新闻的模式和路径驯化了,但这种模式与路径却狭路相逢于微博,微博开启了一个坏新闻才是新闻的时代<sup>4</sup>。正如悲剧往往比喜剧更具有震撼力一样,坏新闻往往比好新闻更接近社会生活的真相与本质,这大体人性使然,微博等网络文化不过迎合和放大了人性而已。在网络尤其是微博文化兴起之前,坏新闻往往可以被蒸发乃至转化为好新闻,但微博却开启了坏新闻模式时代,典型如2012年王立军事件,该事件当天(2月6日)晚上发生后所带来的不安最早是被网民“捅”到微博上的,显现了微博所具有的让坏新闻越来越无法遁形的呈现与诠释的力量。相反地,传统媒体对该事件不但集体失语,而且迟至2月8日才集体转载当时重庆市政府所精心编织的王立军正接受“休假式治疗”的好新闻诠释话语。

这种诠释主体的多元化现象进入微信时代更为显著,专业新闻工作者原有的垄断性逐步让位于竞争性,原有的权威性同时被极大地消解,甚至其本身成为被争议和被解构的对象。比如2015年1月姚贝娜事件,《记者们在病房外,焦急地等待着他的死亡》一文引爆微信,直指整个记者群体:“姚贝娜去世之前,病房外挤满了记者,他们在等,等她死。……新闻就是这样产生的”<sup>5</sup>。这种煽情性、以个人情绪为突破口的质疑文字固然完全漠视新闻工作的职业文化特征,但此举的确凸现了这样一个现实,那就是,公众假新媒体之力业已直入新闻报道的诠释场域,参与对新闻产品边界的建构。而2016年5月的雷洋非正常死亡事件尤甚。对该事件,北京电视台、人民网和中央电视台均以北京警方为信源一边倒地 将雷洋界定为死于心脏病的嫖娼者<sup>6</sup>,可后来尸检结果却被证实为“窒息而死”。对此,《雷洋尸检结果公布,哪些媒体当初混淆了视听》一文被广泛转发于微信,文章指出:

观察这些报道可以发现，它们都只是涉事警方提供的单方面信息，采访并不全面，并没有尽到调查、核实、追究真相的媒体责任。无论如何，这并不算是合格的法制新闻报道。近几年媒体的公信力呈现出不断流失的趋势。这次雷洋事件的反转造成当初新闻报道的失真，不论原因如何，切莫再让媒体的公信力为某些违法违纪行为陪绑。<sup>7</sup>

这里，如果将上海踩踏事件（2014）、姚贝娜事件（2015）、雷洋事件（2016）等串联起来审视可以发现，网络文化的兴起不但让新闻人的专业技能与水准日益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同时，记者社群原有的新闻产品诠释性边界也随之轰然坍塌，从而使得一些记者甚至对“何为新闻”“怎么做新闻”这样根本性的产品边界性问题而心生困惑：

以前做新闻，我们讲究的是事实，要把握事实。现在呢？是情绪，要把握情绪，至于事实是什么不重要的，真相不重要，事实不重要，主要是符合情绪，戳中情绪点。（C3，成都商报，成都，2017年4月19日）

你看看我们的公众号，天天就是范冰冰的胸李冰冰的腿的，这个东西才是比较受欢迎的，阅读率比较高的，这个对我们编辑影响很大，都是用户推着走。而且，以前很斯文，现在反而要靠骂来加强认同，你越骂越粗俗，反而越受欢迎。（C4，成都商报，成都，2017年4月18日）

#### 四、讨论与结论

新媒体对新闻业的冲击不一而足，探讨这方面的文献的视角亦然。为置喙其中，本文取边界工作的视角来解释我国当前新闻业的去专业化之势，同时，为了适应本研究的需要，我们在回溯Zelizer有关记者作为诠释社群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分析路径。具体而言，我们将记者的诠释社群进一步细化为三个维度，即，记者对新闻平台的诠释，对新闻职业的诠释，对新闻产品的诠释。这种对现有理论概念的尝试性推进既吻合于现有研究，也应该对诠释社群等相关理论的发展有所裨益。

在此理论基础上，本文针对不同年代新闻人在平台、职业、产品三个方面的典型性诠释话语进行分析，以审视和解释我国新闻业在新媒体冲击之下所发生的边界工作的变化。本文认为，新媒体的勃兴打破了机构新闻工作者此前所拥有的平台垄断、职业垄断、产品垄断的局面，而代之以平台边界、职业边界和产品边界的失守，从而形成我国新闻业目前的去专业化之势。

就平台边界而言,我国新闻业的发展过程就是平台边界由绝对稀缺向相对稀缺状态不断拓展与转换的过程,而互联网尤其微博、微信的问世则使得新闻平台走向大众化,不再被垄断在机构新闻工作者手中。新闻平台的典型性诠释话语则相应地先后经历政治话语、市场话语、大众话语的变迁。

就职业边界而言,记者职业由国家干部、社会精英逐步下移到新闻民工,而在人人都是潜在记者的数字时代里,新闻的职业门槛越来越低,机构新闻工作者日渐成为数字劳工背景下专业新闻的留守者、公众舆论的边缘人。新闻职业的典型性诠释话语则先后由政治取向、精英取向而转变为普通职业取向,新闻工作者原有的权威性被消解、被祛魅。

就产品边界而言,对新闻报道的内容应该怎么样的典型性诠释话语,在经历政治宣传至上、新闻专业主义崇拜之后,如今在流量至上导向的支配下,开启了一个坏新闻才是新闻、娱乐性才是新闻的话语转向。这继而带来机构新闻工作者对新闻的产品边界及其诠释权的失守,也迎来流量决定新闻的时代。

综上所述,我们将平台边界、职业边界、产品边界的诠释话语变迁综合于表1。

**表1: 新闻边界诠释话语的变迁**

	计划经济时代	市场经济时代	新媒体时代
平台边界	政治话语	市场话语	大众话语
职业边界	政治取向	精英取向	普通职业取向
产品边界	政治宣传至上	专业至上	流量至上

现实来看,新闻边界的失守未必不是好事,在大众表达渠道有限的背景下,新闻边界的失守某种程度上标志着“一元新闻话语时代的逐步结束,和多元化新闻话语时代的渐渐开启”(尹连根,2014:84)。但是,新闻边界的失守又未必是好事,因为公众媒介素养亟待提升、集体言说尚缺乏徐贲(2013)所谓的“明亮的对话”氛围,如此带来的民粹主义在网络的盛行到底不利于民主、健康社会的形成。

不过,任何脱离社会文化情境的新闻学研究都是不公正的。对此,还是Schudson(1995:30-31)说得好:

他们仍倾向于(错误地)把新闻当作信息来看待。长期来看,把新闻当作意识形态也是错误的。新闻是文化。…新闻专业主义不是通过一些抽象专业伦理标准来界定的,而是通过新闻与具体政治结构、特定社会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来界定的。



对新闻边界的失守也应该这样来审视,而决不能简单、轻率地以为专业新闻工作者不作为使然,或者以为乃新媒体技术单一因素使然。的确,新媒体对新闻业边界失守的影响不可谓小,但我们也需要避免陷入技术决定论的迷思,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社会文化因素的作用,比如,全球化、我国日益注重的国际形象、衰退的世界经济对报业经营的负面影响、悠久的言说传统,等。而且,作为文化和社会组织的一部分,新闻业在我国已经具有一定的相对独立性,并业已形成其固有的文化传统,而文化的变迁大都是渐变和相对缓慢的,为此,在新闻边界失守成为既定现实的今天,新闻业固然不可能再维持原有的边界,但也不可能旦夕之间就变得没有边界。而且,现实的复杂性也决定了新闻边界的失守不可能是全国性一刀切的简单现象,换言之,新闻边界失守现象会在不同门类新闻、不同地区、不同性质、不同新闻文化的媒体之间存在差异。

(责任编辑:布和)

### 注释 [Notes]

1. 本段话摘自观察者网文章《前南方周末主编江艺平退休:她将南周变成报业的“黄埔军校”》。检索于[http://www.guancha.cn/culture/2013\\_09\\_26\\_174846.shtml](http://www.guancha.cn/culture/2013_09_26_174846.shtml)。
2. 具体地,主要包括两类资源,一是政治哲学、社会学等其他学科门类,一是西方新闻专业主义思想与理念。
3. John B. Thompson (2000) 的专著Political Scandal就是专门阐述新媒体与政治丑闻之间关系的。
4. 这里的“好新闻才是新闻”或者“坏新闻才是新闻”之说不过套用西方新闻学研究的一种惯用说法而已,并非武断和笼统地确指传统媒体都是“好新闻”或者新媒体都是“坏新闻”。
5. 该文检索于<http://tieba.baidu.com/p/3535166031>。对姚贝娜事件较为完整展示的文字可参见《众声喧哗中,媒体同行相煎何太急!》一文,检索于<http://chuansong.me/n/1765860>。
6. 北京电视台报道《足疗店女技师供述为雷洋“打飞机”家属称已提交尸检申请》,检索于<http://news.163.com/16/0511/13/BMPO5EF30001124J.html>; 人民网报道《北京警方回应“雷某事件”10大疑点及细节》,检索于<http://bj.people.com.cn/n2/2016/0511/c233088-28316134.html>; 中央电视台报道《雷洋死亡当晚到底发生了什么?央视记者专访当事民警》,检索于<http://m.news.cntv.cn/2016/05/11/ARTIhfTWVXj2vSzbMqtXZQqJ160511.shtml>。
7. 《雷洋尸检结果公布,哪些媒体当初混淆了视听》一文检索于<http://wx.7399.com/shuma/531874.html>。



###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 白红义(2014)。新闻权威、职业偶像与集体建议的建构：报人江艺平退休的纪念话语研究。《国际新闻界》，(6)，46-60。
- 陈楚洁(2015)。媒体记忆中的边界区分、职业怀旧与文化权威——以央视原台长杨伟光逝世的纪念话语为例。《国际新闻界》，(12)，26-45。
- 陈楚洁，袁梦倩(2014)。新闻社群的专业主义话语：一种边界工作的视角。《新闻与传播研究》，(5)，55-69+127。
- 陈楚洁，袁梦倩(2015)。社交媒体，职业“他者”与“记者”的文化权威之争——以纪许光微博反腐引发的争议为例。《新闻大学》，(5)，139-148。
- 陈菊红(2005)。《哈佛乱翻书：从<南方周末>到哈佛》。广州：花城出版社。
- 范以锦(2005)。《南方报业战略：解密中国报业传媒集团》。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
- 黄秋耘(1992)。特异的采访。载王曼（主编），《我的记者生涯》（第6-11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 李红涛(2016)。“点燃理想的日子”——新闻界怀旧中的“黄金时代”神话。《国际新闻界》，(5)，6-30。
- 李良荣(1995)。十五年来新闻改革的回顾与展望。《新闻大学》，(1)，3-8。
- 李良荣(2006)。从单元走向多元——中国传媒业的结构调整和结构转型。《新闻大学》，(2)，1-10。
- 李良荣(2008)。艰难的转身：从宣传本位到新闻本位——共和国60年新闻媒体。《国际新闻界》，(9)，6-12。
- 李艳红，陈鹏（2016）。“商业主义”统合与“专业主义”离场：数字化背景下中国新闻业转型的话语形构及其构成作用。《国际新闻界》，(9)，135-153。
- 梁桦、张百宁(2002)。广州报业向何方？——对广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黎元江的专访。《新闻爱好者》，(5)，4-5。
- 林里(1993)。我随陶公粤西行。载王曼（主编），《我的记者生涯（第二辑）》（第8-20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 陆晔，周睿鸣(2016)。“液态”的新闻业：新传播形态与新闻专业主义再思考——以澎湃新闻“东方之星”长江沉船事故报道为个案。《新闻与传播研究》，(7)，24-46+126-127。
- 宁春岩（2011）。《什么是生成语法》。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潘忠党(1997)。新闻改革与新闻体制的改造——我国新闻改革实践的传播社会学之探讨。《新闻与传播研究》，(3)，62-80。
- 钱江（2011）。《吴冷西与“文化大革命”前夕的人民日报》。见：<http://media.people.com.cn/GB/192301/192377/192680/201060/201061/15795915.html>。
- 孙玉胜(2003)。《十年：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童兵(1994)。《主体与喉舌——共和国新闻传播轨迹审视》。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 王海燕(2012)。自治与他治：中国新闻场域的三个空间。《国际新闻界》，(5)，14-20。
- 文有仁(1998)。改革开放二十年与新闻事业。《新闻与写作》，(12)，3-9。
- 吴冷西(1995)。《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段》。北京：新华出版社。
- 肖云(2013)。《席文举与<华西都市报>》，检索于：<http://media.sohu.com/20130604/n377918389.shtml>。
- 谢静(2016)。微信新闻：一个交往生成观的分析。《新闻与传播研究》，(4)，10-28+126。
- 徐贲(2013)。《明亮的对话》。北京：中信出版社。
- 徐铸成(2010)。《徐铸成回忆录》(第一版)。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尹连根(2013)。结构.再现.互动：微博的公共领域表征。《新闻大学》，(2)，60-68。
- 尹连根(2014)。微博空间与参与性受众——基于对深圳“5·26”飙车案网民评论的框架分析。《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76-85。
- 尹连根，刘晓燕（2013）。“姿态性融合”：中国报业转型的实证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2)，99-112+128。
- 尤淇(1992)。击一猛掌之后。载王曼（主编），《我的记者生涯》（第82-91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 余英时(2003)。《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曾繁旭(2009)。社会的喉舌：中国城市报纸如何再现公共议题。《新闻与传播研究》，(3)，93-100+110。
- 张志安，甘晨(2014)。作为社会史与新闻史双重叙事者的阐释社群：中国新闻业对孙志刚事件的集体记忆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1)，55-77+127。
- 郑忠明，江作苏(2016)。作为知识的新闻：知识特性和建构空间——重思新闻业的边界问题。《国际新闻界》，(4)，142-156。
- Blaagaard, B. B. (2013). Shifting boundaries: Objectivity, citizen journalism and tomorrow's journalists. *Journalism*, 14(8), 1076-1090.
- Carlson, M. (2015). Introduction: The many boundaries of journalism. In Carlson, M. & Lewis, S. C. (et al.). *Boundaries of Journalism: Professionalism, Practices and Participation* (pp. 1-18). London, UK and New York, NY: Routledge.
- Domingo, D. & Florence, L. C. (2014). Journalism in Dispersion, *Digital Journalism*, 2(3), 310-321.
- Fish, S. (1980). *Is There a Text in This Class?* Cambridge, MA and London, UK: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Gieryn, T. F. (1983). Boundary-Work and the Demarcation of Science from Non-Science: Strains and Interests in Professional Ideologies of Scientist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8(6), 781-795.
- Hermida, A. (2012). Social journalism: exploring how social media is shaping journalism. In Siapera, E. & Veglis, A. (eds), *The Handbook of Global Online Journalism* (pp. 309-328). Oxford, UK: Wiley-Blackwell.
- Hermida, A. (2015). Nothing but the truth: Redrafting the journalistic boundary of verification. In

- Carlson, M. & Lewis, S. C. (et al.) *Boundaries of Journalism: Professionalism, Practices and Participation* (pp. 37-50). London, UK and New York, NY: Routledge.
- Hujanen, J. (2016). Participation and the Blurring Values of Journalism. *Journalism Studies*, 17(7), 871-880.
- Hymes, D. (1973). Speech and language: On the origins and foundations of inequality among speakers. *Daedalus*, 102(3), 59-85.
- Jenkins, R. (2014). *Social Identity* (4<sup>th</sup> edition). London, UK and New York, NY: Routledge.
- Lewis, S. C. (2012). The tension between professional control and open participation.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15(6), 836-866.
- Loosen, W. (2015). The Notion of the “Blurring Boundaries” . *Digital Journalism*, 3(1), 68-84.
- Pan, Zhongdang & Lu, Ye (2003). Localizing professionalism: Discursive practices in China’ s media reforms. In Lee, Chin-Chuan (et als.) *Chinese Media, Global Context*. London, UK and New York, NY: Routledge.
- Schudson, M. (1995). *The Power of New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and London, UK: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Schudson, M. (2008). *Why Democracies Need An Unlovable Press*. Cambridge, UK and Malden, MA: Polity Press.
- Singer, J. B. (2015). Out of bounds: Professional norms as boundary markers. In Carlson, M & Lewis, S. C. (et al.) *Boundaries of Journalism: Professionalism, Practices and Participation* (pp.21-36). London, UK and New York, NY: Routledge.
- Splichal, S. & Dahlgren, P. (2016). Journalism between de-professionalisation and democratisation.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31(1), 5-18.
- Thompson, J. B. (2000). *Political Scandal: Power and Visibility in the Media Age*. Cambridge, UK and Malden, MA: Polity Press.
- Wang, Haiyan (2015). Intellectual-run-newspapers Versus Statesman-run-newspapers: Wrestling between two journalistic paradigms in pre-reform China, 1949-1978. *Journalism Practice*, 10(5), 663-679.
- Wang, Haiyan (2016).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in China*. Lanham, Boulder, NY and London, UK: Lexington Books.
- Yin, Liangen & Liu, Xiaoyan (2014). A Gesture of Compliance: Media Convergence in China. *Media, Culture & Society*, 36(5), 561-577.
- Zelizer, B. (1992). *Covering the Body: The Kennedy Assassination, The Media, and The Shaping of Collective Memory*.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Zelizer, B. (1993). Journalists as interpretive communities.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10(3), 219-237.